

诗中有乾坤：隐逸之思与存在之思的哲学对话

王佳宁¹, 陈聪^{2*}

1.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辽宁 沈阳 110136

2. 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36

DOI:10.61369/HASS.2026010001

摘 要： 本文是在存在主义哲学视域下，对海德格尔与陶渊明的哲学思想展开比较研究。围绕海德格尔的自然观、生死观、处世观等命题展开对比，揭示东西方哲学面对人类精神困境时给出的不同答案。文章通过对“性情自然”与“诗意栖居”、“善生善死”与“向死而生”、“显隐之道”与“知白守黑”予以对比，得出结论：陶渊明依托田园诗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家园，而海德格尔要求人达到心灵上的自由；在生死观上，对比了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决绝和陶渊明对生死名誉置之度外的安然顺化；在处世观上，揭示了东西方在生存哲学上的趋同之处。尽管二者的哲学思想植根于迥异的文化土壤，但在比较中展现了存在之思与东方隐士哲学碰撞的火花，彰显了存在主义哲学与东方智慧对话的可能。

关 键 词： 海德格尔；陶渊明；存在主义；诗意栖居；跨文化比较

The Cosmos in Poetry: A Philosophical Dialogue between the Contemplation of Seclusion and the Contemplation of Existence

Wang Jianing¹, Chen Cong^{2*}

1. Institute of Japan Studie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136

2. Asia-Australia Business College,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136

Abstract： This study compares Heidegger's and Tao Yuanming's philosophies through an existentialist lens. It examines their perspectives on nature, life and death, and human existence, revealing distinct Eastern and Western responses to spiritual dilemmas. The analysis contrasts key concepts such as "natural disposition" with "poetic dwelling," and "serene acceptance" with "being-toward-death." Findings show Tao created a harmonious spiritual homeland through poetry, while Heidegger pursued inner freedom. Despite different cultural roots, their dialogue sparks meaningful exchange between existentialism and Eastern wisdom.

Keywords： Heidegger; Tao Yuanming; existentialism; poetic dwelling;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引言

东西方哲学虽植根于迥异的文明土壤，但在对人类生存的反思上，常展现出共同的生存焦虑。正如钱钟书所云：“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1]。”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陶渊明就已在儒道思想的碰撞中为个体寻找到了返还自然的生存之道。面对魏晋的动荡时局，儒家的积极入世的思想与老庄“无为而治”的自然思想在他的脑海中激荡，使得他的一生都在二者之间徘徊。袁行霈在其专著《陶渊明研究》中论及陶渊明的哲学思想时说：“诗的思维富于联想和想象是具象的、感性的而且常常是跳跃的、片断的，不适合合作哲学的思考，然而陶渊明恰巧地把两者融合在一起了^[2]。”这种藏在诗文中的哲学智慧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为应对20世纪西方技术理性引发的精神危机，德国哲人马丁·海德格尔将救赎目光投向东方哲学。他洞察到，现代性危机是每个“此在”必须直面的生存困境，作为“此在”的人类，不可避免地意识到死亡、战争等未知的恐惧与痛苦，始终追问存在的本质意义。他从诗人荷尔德林的诗中得到了启发，此在只有诗意栖居，才能复归人的本真状态。

中西方不同的社会现实却昭示着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对此，陶渊明复归返自然的生存方式与海德格尔诗意栖居的精神追求，共同给出了答案。因此本文将从三个维度对陶渊明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进行对比研究。二者生活的年代、国情不同，由此孕育的文化结构也必然迥异。但他们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体察，共同构成了中西方哲学的不同回答。本文从自然观、死生观、处世观三个方面与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对比，展现西方的存在之思与东方隐士之间碰撞的思想魅力。

一、“性情自然说”与“诗意栖居说”

钟嵘在《诗品》中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田园诗本质上是对魏晋时期文人意识觉醒的回应，他在诗文中表现了生活在自然中的人的生命体验，是一种地理空间对于自然环境的回归，更是一种精神栖居地的构建。因而将他的自然观称为“性情自然”^[3]。所谓“性情自然”，指的是陶渊明发展了老庄思想，希望人与万物按自然规律生存，注意个人感受，不受外在环境束缚而按照生命本性去存在，回归原始的生活状态去生活，躬耕以谋生，无求于世俗，才能真正得到自然。返回园林的原始生活是返自然的途径^[2]。

在他的诗文中，藏有“性情自然”的道家哲学智慧。《归去来兮辞》中，“其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一句，鲜明地展现了陶渊明放任自然、顺应本真的一面。全篇更是处处流露其辞官归家时的畅快心境。而“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一句，则揭示了他此刻仍深陷于入仕与出世的矛盾之中，是对人生目标的重新审视。而返自然的行为，也正好符合道家强调“道法自然”的观念。《老子》一书中曾经阐述过小国寡民的思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4]《桃花源记》一文正是陶渊明受老庄思想影响的乌托邦之作。“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5]人民安居乐业，依山而居、男耕女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图景是陶渊明“性情自然”的外化。陶渊明隐居山野，与邻里相处融洽，时常饮酒赋诗，深刻体现了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精髓。再如《归园田居》中，“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6]一句，既点明了陶渊明“性本爱丘山”的本真性情，更深刻揭示了他要挣脱官场的樊笼，归隐山林的决心。对他而言，实现理想抱负固然重要，但守护内心的精神自由则更为可贵。

在“自然观”这一问题上，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与陶渊明有着相似之处。海德格尔与陶渊明皆表达出对人的生存处境的深切关怀，核心关切在于人的生存本身，指向对人类精神家园的追问。所谓“诗意栖居”，即“人类只有对命运之声聆听，才能为顺应天命而进入天地人神的四方游戏做好准备，才能‘诗意的栖居于大地之上’”^[6]。海德格尔提倡回归自然，回归到人和自然相生相对的自然状态下，生活在天、地、人、神的环境中，才算是“诗意栖居”。现代文明改变了人类的的生活方式，也异化了人类。人类的栖息应该回归农耕文明的本源，而非工业城市的某一处世界。“所谓人存在，也就是作为终有一死者在大地上存在，意思就是：居住。”^[7]所以真正的栖居包含生活在地球上的自然山水中与忘记劳作的琐碎与生存的奔波而生活在自由中的双重含义。

具体而言，诗意的生存应该有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维度，前者属于哲学，其指归在人生的皈依及其意义，后者则指向人的自我生命的具体实现^[8]。海德格尔与陶渊明皆以“诗意地栖居”为理想的人生存在方式。在形而上的层面，海德格尔认为，实现诗

意栖居的根本途径在于“诗”。对他而言，诗的本质是创建性的语言，是“存在之家”，人通过诗性的语言得以“栖居”于存在之真理中，从而与“自然”和谐共在。在形而下的实践层面，陶渊明则以其躬耕田园、吟咏性情的实践本身，构建了生存范式。栖居的本质，在于守护人的本真自由，使其免于沉沦于“烦”所致的异化。因而，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更加偏向于精神层面的摆脱“烦”的一种方式，陶渊明则是偏重于构建一种性情自然的实践。在追寻人类精神家园这一根本诉求上，海德格尔与陶渊明达成了共识，于陶渊明，归隐田园是生活方式，也是精神家园的实践；于海德格尔，则旨在引导人摆脱异化，实现心灵的自由。

二、“善生善死说”与“向死而生说”

苏联哲学家弗罗洛夫曾说过：“任何一种哲学体系如果不能诚实地客观地回答与死有关的问题，它就算不上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9]对“人应如何本真存在”的追问，必然引向对死亡的思考。陶渊明秉承道家思想，形成了“善生善死”的生死观，即在洞悉生命有限性的基础上，尊重规律，珍视当下；海德格尔则从存在主义出发，提出“向死而生”，强调将死亡作为此在的终点，以此寻找此在生存的意义。

鲁迅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到：“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10]庄子曰：“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为父，而身犹爱之，而况其真乎！”^[11]人应坦然面对死亡，甚至怀抱“乐死”之情，如同迎接新生般迎接死亡。按照人生命的规律，接受每一个阶段的人生变化，顺势而为。他的诗文层层递进地阐释了其生死观。首先，他清醒地认识到死亡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在《形影神三首》中，“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9]一句揭示了死亡对众生的普遍性与平等性，指向一种“生亦何欢，死亦何惧”的超然。其次，他道出了死亡的虚幻性与对死亡的超然态度。在《归园田居》其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9]一句揭示了生命的虚幻本质，体现了人终究会归于虚无。最后，他表达了道家看淡生死，珍惜当下的核心。在《挽歌诗》中的一句“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9]，以磅礴的自然意象描绘出了诗人将躯体托付山陵的决心，化解世俗观念中生与死的对立，将人的生死纳入自然循环。在《自祭文》中，“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9]一句更鲜明地彰显了其“善生”态度：与其汲汲于身后虚名，不如珍惜当下，坦然面对。

在死亡观上，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是“向死而生”。“向死而生”，旨在将死亡从其惯常的“遮蔽”状态中召唤出来，当死亡从“不在场”转为“在场”，此在方能真正领悟自身“终有一死”的本质，从而通达本真的生存状态。^[13]死亡使此在不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也正是死亡才使此在获得整全。此在在死亡中实现了自

身的完整性，却丧失了此在。“此在在死亡中达到完整同时就是丧失了此之在。”^[12]死所意指的结束，不是我们认为的此在的存在到了尽头，而是此在这一特殊的存在者的一种向终结的存在。^[13]也就是说，人类作为此在不可避免地踏上死亡之路，而死亡本身是此在无可避免的完成其使命的过程。死亡意味着此在生命的结束，但却是此在存在意义上的延续。作为“此在”的人，本质上就是一种“向死存在”。海德格尔正是由此提出“向死而在”的核心命题：不是逃避死亡，而是清醒地认识到生命终将归于虚无这一根本境况，即使知晓终点，依然活出意义。他强调通过直面死亡来认识自我、追问意义。

正是在这种豁达而积极地面对死亡的态度上，陶渊明与海德格尔产生了深刻的共鸣，都将死亡视为人生的必然，倡导对生命过程的积极投入。二者生死观的对比，最终指向东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究其根本，是中国“天人合一”与西方“天地人神”观念的差别。陶渊明哲学思想的根基深植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是其本质内核。对海德格尔来说，现代性的价值危机，将人与自然推入主客二元的对立困境。他提出的救赎之途，正是“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消除二元对立。在其后期思想中，“四重整体”概念居于核心地位——它由“天空”、“大地”、“诸神”、与“终有一死者”构成。海德格尔强调：“从一种原始的统一性而来，天、地、神、人‘四方’归于一体”^[7]。海德格尔此论，显著突破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与神话思维的框架。他可能受到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启发，摒弃了西方文化中常见的神、人、自然相互对立的心理模式^[14]。进而都指向“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强调自然与人类的相互依存。

三、“显隐之道”与“知白守黑”

《老子》二十八章中提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14]所谓“知白守黑”，即洞悉光明之境，却甘居幽暗之地，以此作为天下的范式。陶渊明的人生哲学和海德格尔后期哲学思想的焦点，便是“知白守黑”。陶渊明人生的显隐之道，不仅是政治上的进退，更是一种在乱世中的生存策略，其精神内核与老庄“知白守黑”的哲学思想息息相通。而海德格尔在其后期哲学中对“解蔽”与“遮蔽”、“光明”与“黑暗”的思考，在哲学层面与“守黑”的哲学思考不谋而合。

陶渊明身怀济世之志，但身处政治漩涡，抱负难以施展，遂逐渐趋向老庄的避世思想，寄情山水，选择“守黑”——以“隐”的方式回归自然以守护本真。其《答庞参军》中“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5]的自述，正是“守黑”心态的鲜明写照。陶渊明的显隐之道，恰是“知白”与“守黑”的辩证统一：早年奔波入仕是“知白”，是深感儒家治世理想并试图实现理想抱负，但他的历程注定是艰难的。事桓玄时，尚且怀有整肃晋室的希冀。后

来，陶渊明因丁忧而离任，也并没有预计到桓玄谋逆；后应刘裕召为镇军参军途中，所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已流露出他心中背负的矛盾，眼见鱼鸟自在，自己却“误落尘网”，背离本性；最终，担任彭泽县令仅八十日欣然归隐。这是在目睹朝局倾颓、理想幻灭后的主动选择。他的哲学思想逐渐转变为“守黑”。陶渊明的归隐，并非消极逃避，而是不可为而不为的道家智慧。

“隐匿”是海德格尔自然思想的关键范畴，贯穿其不同时期的著作^[15]。在道家语境中，“知白守黑”可视为“隐匿”的本土化表述——它指向对存在问题的源性回溯以及对形而上学局限的反思^[15]。从词源看，“隐匿”的希腊文原义关联“遗忘”，根植于“被遮蔽的状态”。前期海德格尔将“存在”视为被遗忘者，旨在唤醒对存在问题的关注，至后期，他意识到以“存在”为隐匿所指仍未能触及遗忘的源性，遂转向更切近本源的“思”——这一既承袭希腊传统又蕴含存在深意的概念——替代“存在”成为隐匿的终极指向^[15]。在此意义上，“隐匿”是此在透过自然的遮蔽探寻存在本质的方式。海德格尔强调，作为存在者整体的自然具有强大的在场力量。然而哲学史的演进导致这种源始本真的在场因隐匿而丧失其原初性^[15]。“我们尚未足够清晰地经验到在隐匿中显露给我们的东西，因为我们尚未了解隐匿本身，尚未了解非诗意中的诗意^[16]。”故在后期思想中，唯有通过诗性，方能体验被隐匿的自然。“知白守黑”恰可诠释此解蔽的辩证性：唯有认知“黑”，方能持守“白”；唯有洞察自然的自我隐匿，才能真正实现其本真显现^[17]。这就是“知光亮者，自隐于黑暗”的深意。

在海德格尔看来，真理本质上是解蔽与遮蔽的辩证统一，可喻为“光明”与“黑暗”即“白”与“黑”的共生。其“知白守黑”的哲学实践，要求人洞悉光明到达的地方，却不忽视黑暗之处。在此隐喻中，技术恰似“那一抹光亮”，虽然便利了人类的生活却遮蔽了本真；光明的存在使人明确白与黑的界限；回归黑暗就是重返存在的本源。如果将真理看作是光亮，那么海德格尔所批判的，正是西方形而上学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它忽视了黑暗中藏匿的真理。

最终，陶渊明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在知白守黑中汇合，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中碰撞。无论是知白还是守黑，都不是二者哲学思想的终点，为人类寻找最终的精神归宿才是哲学的核心。正如海德格尔主张，真正的解蔽需“投入黑暗”——接纳遮蔽，寻找真理。

四、结语

陶渊明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的终极指向，皆在于寻求人文关怀，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探寻精神的出路。陶渊明的“性情自然”、“善生善死”等哲学观念带有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对生命意义的独特思考。他以回归自然的方

式实现了精神的超越。面对现世的劳顿，陶渊明开出的药方便是回归自然。“性情自然”是他为中国知识分子另辟蹊径的生存之路；“善生善死”是面对人生困顿之时寻求意义的价值之路；“显隐之道”是超越时代局限性的最优选择。海德格尔一生致力于探究人类精神困境，对他而言，“回归自然”固然重要，但更核心的

在于实现身心的本真自由。他期望通过诗意栖居的方式，找到此在存在的方式；通过“向死而生”的死亡观，找到此在存在的意义；通过知白守黑，找到此在的精神家园。海德格尔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方哲学。天地人神”的观念，与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实现汇通，展现出东西方智慧的精神共鸣。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 谈艺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2] 袁行霈. 陶渊明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 杜景华. 陶渊明传 [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4] 汤漳平, 王朝华译. 老子 [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14.

[5] 陶渊明. 陶渊明全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6] 李霞玲. 海德格尔存在论科学技术思想研究 [D]. 湖北: 武汉大学, 2012.

[7] 海德格尔, 孙周兴译. 演讲与论文集 [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8] 罗宜家, 刘润芳. 诗意的生存与陶渊明 [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6: 98-104.

[9] (苏) 科恩. 自我论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

[10] 鲁迅. 而已集 [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8.

[11] 郭庆藩. 庄子集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12] (德)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13] 邱丹丹. 海德格尔与陶渊明: 死亡与栖居之研究 [D]. 兰州: 兰州大学, 2014.

[14] 邓晓芒. 中西文化心理模式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15] 陈梦晖. 隐匿·敞开·神圣: 海德格尔后期诗性自然观的内生逻辑 [J]. 南都学坛, 2024, 44(04): 94-101

[16] 海德格尔著. 孙周兴, 杨光, 余明锋译. 从思想的经验而来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17] 张志伟. 白天看星星”——海德格尔对老庄的读解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2(04).